



铁山摩崖石刻



石刻字迹及风化现状

邹城市铁山摩崖石刻本体保护利用研究

李来营

充满神话色彩的铁山摩崖石刻,位于山东省邹城市城北铁山之阳花岗岩石坪上,为邹城市四山(铁山、岗山、峰山、葛山)摩崖石刻之一。铁山摩崖石刻为北周时期著名僧侣书法家刊刻在花岗岩石壁的佛经和题跋文字,是研究我国宗教文化、书法艺术的重要材料,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社会价值。2006年,铁山、岗山摩崖石刻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石刻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损坏和侵蚀。因此,开展铁山摩崖石刻本体保护研究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铁山摩崖石刻,刻于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面积1037平方米,石刻内容包含《大集经·穿菩提品》经文节选、颂文和题记,为“金刚经文”“石颂”和题名三部分。经文共17行,900多字,字径为40至60厘米;石颂,每字宽70至95厘米,高80厘米,是颂文的标目。颂文字径较小,内容记述经主、书写者及刻经年代,实际就是刻经的跋文。刻经主持者是西汉丞相匡衡后裔匡匡,书写者是北齐的僧人安道壹。整个石刻书法奇伟,雄逸高古,以变隶为主,篆、楷、行各种书体兼而有之,可与泰山摩崖石刻相媲美。石刻自清代乾隆末年就被屡见著录。

邹城铁山摩崖石刻是在北齐时末法思想兴盛及北魏太武法难、周武法难两次灭佛运动的背景下兴起的。出于末法观念的影响和灭佛运动的打击,为了实现永久保存佛法的目的,广大信众广造窟像、大刻石经,力图使佛法永恒,从而催生了摩崖刻经这种佛教书法新形式。铁山摩崖“兼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等颂文字样直接反映了这种历史背景。铁山摩崖石刻在字体结构上横画平正含蓄,舒长的笔画使其意态饱满沉雄,字势宽博舒展,字内空间疏密对比明显,以密映疏,显得疏朗虚灵。整体浑圆含蓄,显得安详肃穆,舒展虚灵,正是佛教所崇尚的空寂、庄严审美理念之外化。摩崖石刻与周围山林环境和谐共处,构成了具有较高审美性的石刻景观。

铁山摩崖石刻现状分析

经过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发现铁山摩崖石刻

目前面临着多种威胁。首先,铁山摩崖石刻处于露天的自然环境中,自然风化是石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长期暴露在风吹、日晒、雨淋、冻融等自然环境中,导致石刻表面出现剥落、开裂等现象。其次,生物侵蚀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铁山摩崖石刻主要受植物病害影响,杂草、灌木等植物的生长加速了石刻的劣化过程。植物的生长导致岩石下部蓄水能力增强,造成冻融病害加剧;同时植物根部的生长有加剧岩石裂隙的作用。此外,人为因素如游人触摸踩踏等行为也对石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目前铁山摩崖石刻已安装安防系统,该类不文明行为已基本杜绝。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复杂多样。自然因素方面,邹城市属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差较大,这种气候条件加速了石刻的风化过程。同时,保护资金和专业人才的不足也制约了石刻保护工作的开展。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威胁着铁山摩崖石刻的长期保存,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铁山摩崖石刻本体保护利用策略

针对铁山摩崖石刻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保护策略。

一是开展科学修复工作,按照“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文物修复原则,恢复摩崖石刻本体原貌。这包括对石刻表面进行清理,去除有害生物和污染物;对破损部位进行加固和修复,使用与原材料相容的材料进行修补。修复方法可借鉴葛山摩崖石刻保护项目做法,针对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病害主要采取割刈和化学杀灭的方法进行治理;针对石刻本体的浅表面污染主要采取物理清洗法和高温蒸汽清洗法进行清洗;针对机械裂隙主要采取填粘粘接进行加固,防止其进一步劣化;对摩崖石刻表面进行纳米材料封护,延缓石刻表面风化速度。同时,建立定期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問題并采取相应措施。

二是加强环境保护,落实文物保存的长效措施,从根本上减缓外部环境对文物的影响。可以在石刻周围设置保护性建筑或遮雨棚,减少自然环境对石刻的直接侵蚀。同时,改善石刻周围的排水系

统,防止雨水积聚对石刻造成损害。保护设施可借鉴葛山摩崖石刻保护项目做法,在现有围挡的基础上建设钢结构保护大棚,从根本上减缓雨水、温度、光照等外部环境对文物的影响。保护大棚的设计施工要在做好保护摩崖石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地势、环境等因素,设计出入口及进入文物本体的内部参观路线,做到与保护大棚、周围环境和谐相处又利于参观。

三是实施数字化保护,推动“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让游客“穿越”,与摩崖石刻对话。利用三维扫描、摄影测量等技术,对石刻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记录和存档。这不仅可以为石刻的保护和研究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还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增设人机互动设备,建立摩崖石刻数字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铁山摩崖石刻的艺术价值。目前,邹城市文物保护部门委托有资质单位正在实施该项工作。项目实施后,可复原石刻本来面貌,找回石刻中消失的文字,还可以实现石刻数字化永久保存,赋予石刻新的生命。

四是加强公众参与和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石刻,呵护石刻。针对书法爱好者和佛教文化研究者开展研学游活动,让人们在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的结合中进行交流、体悟,在浓厚的学习交流氛围中传播石刻文化价值。同时,为满足展示传播、设计艺术、文旅推广等多元化文化需求,打造石刻拓片、临摹字帖、文房与茶香生活等产品,让石刻文化、中国书法走进日常生活,让石刻可感知、可传播、可应用,让“国保会说话”,真正让石刻“活”起来,使人们了解并爱上石刻,进一步保护石刻。

此外,还应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培养专业的文物保护人才,为石刻的长期保护提供人才支持。铁山摩崖石刻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任重道远。通过分析石刻的现状和问题,提出科学修复、环境保护、数字化保护和公众参与等综合保护策略。这些策略的实施需要文物保护部门、专业机构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多方协作、采取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才能确保铁山摩崖石刻得到妥善保护,使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得以永续传承。未来,还应继续深入研究石刻保护的新技术、新方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更多借鉴。

以法治护航文物数字化 赋能文化传承新时代

风向标

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人类文明形态的今天,承载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文物数字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总则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文物保护信息化建设,鼓励开展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采集和展示利用。”这为做好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和法律依据。

法治筑基：构建文物数字化保护的四梁八柱

法律体系是文物数字化发展的定海神针。我国已形成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涵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的多层次法律框架。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将数字化纳入法定保护范畴,为文物资源的全息记录、永久保存提供了制度保障。从《“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到《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推动建立文物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全国文物资源的数字化统筹。这些制度创新犹如精密齿轮,既保障了文物本体安全,又为数字技术应用划定了清晰边界。

科学立法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推动文物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与科技发展、信息技术应用相适应,才能实现文物行业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及时健全了文物保护数字化法规体系的顶层设计,对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中可能面临的技术挑战和法律问题,进一步通过出台条例、法规和政策文件,及时进行规范、引导和鼓励,确保文物数字化工作在法律框架内顺利进行,同时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只有坚持问题导向,让法律始终跑在技术前面,才能确保文物数字化行稳致远。

执法效能是法治落地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数字敦煌”“数字长城”等项目的成功实践,离不开严格的执法保障。面对擅自传播文物数据、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必须建立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监管能力。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文物执法督察,实现对文物安全高效监管,形成“有责必问、问贵必严”的闭环管理,确保法律刚性约束落地见效。

创新驱动：激活文物数字化发展的一池春水

数字技术为文物保护带来革命性变革。通过三维扫描、虚拟现实等技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得以立体呈现,

故宫文物的细节特征得到精准记录。这些创新实践不仅实现了文物的永久保存,更创造了全新的文化体验方式。“数字北京中轴线”项目通过沉浸式技术,让公众在虚拟空间中漫步7.8公里的文化遗产带,这种“可参与、可互动”的传播模式,使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深度融合。

技术创新需要法治保驾护航。当文物资源转化为数字资产时,必须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保护机制。从数据采集、存储到使用、交易,每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例如,建立文物数字化成果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对高价值文物数据实行特殊保护;制定数字文物资源开发利用标准,防止过度商业化对文化遗产造成损害。这些制度设计既释放了技术红利,又守住了文化安全底线。

文化传承需要创新表达方式。在法治框架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数字化建设,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格局。从“互联网+”到“数据要素x”,推动了数字技术与文物行业的深度融合,拓展了文物资源的数字化阐释空间,擘画了文物数字化的新方向,吸引众多科技企业、高校院所共同参与,开发出AR体验、数字文创产品等,使沉睡的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消费的文化产品。

价值引领：谱写数字时代文化传承新篇章

文物数字化的终极目标是传承中华文明基因。数字技术不仅能保存文物的物质形态,更能挖掘其背后的精神价值。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数字复原,让人们直观感受古代军事制度的恢宏;甲骨文大数据平台的建立,为研究汉字演变提供了全新视角。这些成果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文化自信的彰显。

法治保障下的文化传承,需要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在鼓励数字创新的同时,既要防止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化,也要鼓励文物数据资源的有序共享和合理利用。例如,建立文物数字化成果合理使用制度,允许非营利性机构在一定范围内免费使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激发创作者积极性。这种平衡既保障了公众的文化权益,又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动力。

站新的历史方位,文物数字化正成为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从敦煌到故宫,从长城到大运河,数字技术让文化遗产突破时空限制,走进千家万户。法治的护航,让这种传承既有制度保障,又有创新活力。当古老文明与数字时代共鸣,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必将在传承创新中生生不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西递文化遗产保护与执法实践

——以“泊心云舍”案件为例

王福武

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至今已近970余年历史,是胡姓家族的聚居地。整个村落呈船形,四面环山,两条溪流穿村而过,街巷沿溪而设,青石铺地,空间布局自然流畅,动静相宜。西递现存古民居155幢,包括敬爱堂、刺史牌楼、瑞玉庭等,均为徽派古民居建筑艺术的典范。2000年,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西递村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西递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西递古建筑群以木结构为主,砖墙围护,采用抬梁或穿斗构架,院落平面对称,装饰以砖、木、石雕为主,色彩以白墙黛瓦为基调,整体保存完好,是皖南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然而,2022年至2023年期间,一场涉及文物保护的执法案件在西递村悄然发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关注。

案件经过:违规行为与迅速响应

2021年,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泊心云舍”项目,该项目位于西递古建筑群的保护范围内。2022年至2023年,黟县泊心云舍民宿管理有限公司在对原西递行馆进行改造提升的过程中,未履行文物涉建审批程序,私自挖掘水池和地下通道。具体行为包括:在原西递镇政府后院挖掘水池约131平方米,在原西递镇政府和明经园宾馆之间挖掘地下通道长约15米。该行为被发觉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指令县文化旅游体育局执法部门展开调查。2023年8月,经现场勘验,确认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2023年12月,经省文物局专家评估组现场查勘,认为该行为对文物建筑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隐患,破坏了环境风貌。

黟县文化旅游体育局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对涉事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该公司接到处罚后,立即进行整改,并缴纳罚款。“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文化旅游体育局、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查处黟县泊心云舍民宿管理有限公司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递村古建筑群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案”被评为2024年度全国文物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十佳案卷”。

执法亮点:快速、精准、用情

快速响应:遏制违法影响。案件发生后,黟县县委、县政府迅速行动,主要领导直接过问,集中研究案情,指令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即刻介入调查,相关部门配合查处。这种快速应对树立了政策导向,回应了社会关切,有效遏制了违法行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为后续的法律程序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行动充分体现了当地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政治责任心和敏感性,展现了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担当。

精准执法:维护法律严肃性。涉事企业是县政府的招商引资对象,项目为县重点项目。执法人员坚持“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进行精准定性,并按法定程序予以处罚。这一举措体现了当地政府和部门对文物违法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对全社会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彰显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情理化人:柔性执法与普法教育结合。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积极与当事人沟通,安抚其情绪,耐心细致地开展文物保护普法工作。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让当事人主动承认错误,接受处罚决定并积极整改。这种柔性执法方式不仅避免了对企业投资积极性的打击,还维护了当地的营商环境,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办案启示:从个案办理到长效治理

此次“泊心云舍”案件依法处置完毕,办理过程有四点体会,为文物管理部门开展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文

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强烈使命感投身其中,让文物保护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

必须压实安全责任。构建清晰责任体系,明确各部门、岗位权与责,避免推诿、扯皮、拖拉等情形发生。强化日常监督,建立定期巡查与不定期抽查机制,及时发现隐患。同时,严格责任追究,对失职渎职行为严肃处理,以高压态势倒逼责任落实,全方位守护文物安全。

必须加强队伍建设。文物人才队伍建设是推动文物事业蓬勃发展、守护人类瑰宝的核心力量。唯有通过加强人才培养、创新激励机制、优化人才结构等举措,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文物人才队伍,才能为文物保护工作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文物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

必须加大普法宣传。通过案例曝光、新媒体传播等形式,结合国家宪法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等重要节点,开展文物保护宣传,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鼓励公众监督,对举报文物违法行为的公众给予奖励,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发挥志愿者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如西递村的志愿打更队和“西递大妈”,通过他们的日常巡逻和宣传,增强公众的保护意识,以“群防群治”应对历史文化村镇、街区的“侵蚀性破坏”。

经验总结:西递村通过长期实践,在各级政府和文物等部门指导下,形成一套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机制

制度化的执法与监管。西递镇建立了常态化巡查机制,由综合执法大队通过24小时巡查,对镇域主干道和景区景点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即时处置,严厉打击遗产地内的违法建设行为。近年来,已处理多起遗产地房屋违法维修案件,有效遏制了违法行为的发生。

可持续化的保护与利用。西递镇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文化遗产



西递古建筑群俯瞰



整改现场

资源,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经济支持。通过打造非遗体验馆、民俗活动等旅游新业态,既促进了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又提升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网格化的基层治理与运行。西递是村镇所在地,是遗产地,也是居住地。基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文物的存续与传承。西递镇通过“网格化”管理,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基层治理体系,通过“百姓点单、网格员接单、调度中心派单、职能部门接单”的模式,及时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问题。镇纪委通过“网络化”设计,让监督检查到边到角,对违规行为敢于亮剑,确保文化遗产保护责任落到实处、落到细处。

“平民化”的管理与监督。西递村的志愿打更队和“西递大妈”等志愿者队伍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志愿打更队通过夜间巡查,守护古村落的安全,而“西递大妈”则协助开展治

安巡逻、法治宣传等工作。同时,不断畅通举报渠道,鼓励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全社会“共监、共护、共促”的良好氛围。

总结与展望

西递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和中国传统村落,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强化执法与监管、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基层治理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等多种措施,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泊心云舍”案件的处理,不仅体现了当地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担当和能力,也为其他文化遗产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西递村将不断总结提升,完善机制,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让西递村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更深层次的保护,在新时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未来,黟县乃至安徽省将继续以此次案件为契机,全面摸排域内遗产地、文物保护单位等保护利用情况,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加强常态化巡查检查和宣传引导,共同打击防范文物违法违规行为,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24年度全国文物行政处罚“十佳案卷”纪实